端午是中国古老的节日，又称“端阳节”“天中节”“天医节”“龙舟节”“诗人节”“粽子节”等，从众多名称中，就能感受到节日内涵的丰富与生命的活力。

具有千年历史的端午节，影响范围广阔，虽然各地自然风土与人文环境有所差异，节日习俗各有侧重，甚至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共性大于差异，并且在根本的季节感受、身体保健与伦理期待上基本一致。端午是中国人的共同节日。2009年，它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又属于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

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文化同质化、平庸化的困扰，要保存传承民族文化，就必须重视传统节日这一文化传承的载体与时间节点，让传统节日与大众日常生活发生密切关联，以其周期性复现的特别优势，一年一度地强化它的传承与建设。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端午不仅是享受传统节日的温情，更是传承与创新民族文明的重要方式。我们应该从建构与创新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认识端午节俗文化。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之所以在抗战时期写作《端午考》，强调龙舟的意义与龙崇拜，就是意图从传统节俗中寻绎新的民族文化精神依据。虽然他的结论现在不见得完全被接受，但闻一多的研究意识值得认同。

端午的生命意识与家国情怀

□萧 放

从节俗起源看，消灾避疫是端午时节的原始主题，是本原意义的节俗，因此也是流传最广泛、最持久的节俗。在当代社会，端午节俗的这一原始主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湿热的夏季仍然难熬，也是传染性疾病高发时节，人们还不能完全避开高温的不适与瘟疫的威胁。期盼生活的顺利与平安是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人们同样需要从物质或心理上得到一种安全保障。因此，处于阴阳二气转换的端午节，人们必然仍会选择传统的文化手段，来卫护生命。

端午传统节俗中的戴五色线，门口挂艾、菖蒲或艾蒿煎水洗浴，佩戴装有药草的香包等，这些避瘟保健的节俗有着实际的生活辅助意义，所以一度有人将端午节称为“卫生节”。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端午节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 在当时那种情形，这首民谣带给人们一种特别温馨的感觉。民谣之所以温情、动人，因为它巧妙地传承了端午古老的避瘟保健的节俗意涵，符合了当时广大民众寻求精神慰藉的民俗心理。

人是文化动物，有自己的族群与特定国家意识，人们不仅需要基本的物质生存，也需要文化的延续。文化延续的关键在于族群的延续，要保障族群生命的恒久，就必须有强固的族群意识。屈原等爱国志士所代表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一直激荡在中华大地上，也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子孙不屈不挠地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六朝时期，楚地民众将追悼屈原纳入端午节俗之中，对端午食粽与飞舟竞渡的节俗进行新的诠释。这种诠释并非空穴来风，它是民众历史情感的聚焦，是民众历史观念在节日习俗中的体现。人们已不满足于此前对生活习俗的一般性解释，将节日习俗与历史人物的纪念并联起来。在屈原故里的秭归人将粽子视为屈原的纪念物，当地流传着这样的《粽子歌》：“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洁白，半世熬煎。”端午节正是因为有追悼屈原的历史传说的加入，赋予它历史和伦理的意义，使这一平常的夏季节日在唐宋之后逐渐升华为一个全国性的民俗大节。

屈原的故事，因为有了端午节的周期性的讲述，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在世界文化融汇的大潮中，要守住自己的文化身份，增强民族的内聚力，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十分必要。在端午节中开展多种传统节俗活动，将文化传承融入民俗节日之中，让人们在端午这个特定的节日中回归传统。在与祖先的对话中，感受伟大爱国诗人人格的高尚，增强民族意识与文化的使命感，让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在现代生活中延续更新。

夏季是生命长养的季节，夏季的节日以生命的养护与生命力的激发为主题。对自然时气的避忌、对历史先贤的崇敬，在于对个体生命与群体精神的保护与养育。在盛大的夏季节日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命观念与家国情怀。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美在生活

魏晋名士的园林生活美学

□余开亮

魏晋伊始，园林大量地进入中国文人的生活领域。魏晋名士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在园林中展开了游山玩水、把酒咏文、艺术雅集、谈玄论道等诸多活动，构筑了一个以园林为载体的身心息止之乡和生活美学世界。

仇英《兰亭图》扇面

园林山水 生命情意

魏晋名士率先以园林的艺术形式组合了山水，也以园林的生活方式彰显了自身的生命情意。《世说新语·言语》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其中，“濠”“濮”二字取自庄子“濠梁观鱼”与“濮水垂钓”典故，意喻一种与鱼鸟同幽游，与自然同一体的回归生命本性的畅快之境。在魏晋名士眼中，当下会心的园林山水、林木、鸟兽禽鱼不但给人亲和、亲近之美感，而且直接让人领会生命的适性逍遥。正因如此，魏晋名士都喜欢置身园林美景当中，既游目骋怀于山水美景，又感受着生命的悠闲自在。

嵇康宅中有一棵茂盛的柳树，嵇康则在柳树四周凿池激水。每到夏天，他就在柳树下时而遨游嬉戏，时而锻铁自娱。潘岳在洛阳闲居之时，在自家园林中筑室穿池，养莳花木，并扶老携幼共游园林，感受喜气融融的天伦之乐。孙绰在会稽东山因山倚林，修筑园林，并在居斋前细心地种了一株松树，独赏其一无用处的“楚楚可怜”。谢安、王羲之、许询、支遁、李充等人在会稽都建有园林，这些志趣相投的朋友经常在一起放情丘壑，有终焉之志。陶渊明归隐的园田居，则有另一番自然野趣之美。十余亩的园宅背山临水而建，八九间草庐有东轩有西庐；堂前罗列着扶疏的桃李，后檐种植着成荫的榆柳；东西则是花药分列，林竹翳如。诗人在躬耕之余，时而看白云出岫、倦鸟飞还，时而手抚孤松、看夕阳将下，时而采菊东篱、见悠悠南山。魏晋名士步入园林，让自身化进了天地宇宙，从而成为一幅天人合一的写意画卷。

张大千《竹林七贤图》

酒香园林 诗意源地

感受园林景致之美，魏晋名士的园林生活还离不开酒和诗文。王恭言：“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此话表明了能饮酒能作文当是名士的基本条件。王蕴云：“酒，正使人人自远。”酒在魏晋名士那里不简单地只是一种嗜欲之物，还具有浇愁避祸、超然烦顿、使形神相亲的文化意义。魏晋名士们大多喜欢在园林中边饮酒边游园边赋诗，或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或随兴小酌畅叙幽情。

酒香的园林生活，实是诗意的根源之地。曹魏建安名士在邺城西园、玄武苑中“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由此造就了中国五言诗的兴盛。竹林七贤个个善饮酒，其中刘伶、阮籍、阮咸更是以嗜酒闻名。在风姿摇曳、清音徐徐的竹林中，饮酒作文当是七贤聚会的主要活动内容。西晋名士在石崇的金谷园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在玄醴染朱颜的热烈气氛中，既成就了《金谷集》（已佚），又成就了赋诗不成罚酒三斗的饮酒风尚。王羲之、谢安等42位名士，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三月三日聚集于崇山峻岭、清流激湍的郊野园兰亭。这些东晋名士列坐在曲水两旁，让装有酒的杯子在弯曲的水面上飘流。水流曲折，酒杯时流时停。当时的规矩是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赋诗，否则就要罚酒。这次文人雅集，不但留下了代表东晋文学成就的《兰亭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园林对石渠曲水景观的设计。到陶渊明那里，园林饮酒开始大量地成为一种诗歌题材进入中国诗史。陶渊明在同一年秋天饮酒后就陆续写了20首《饮酒诗》。这些诗作借饮酒为题，多抒发自己的园林生活以及人生感悟。美景怡人、美酒醉人，诗意的文字就自然流淌出来。诗、酒与园林美景的交相辉映，编织出了魏晋名士人生的诗意面向。

画境文心 思想园地

不唯作诗，魏晋名士还在园林中展开了其他各种文艺活动。音乐与园林都能颐养情志，涤荡灵魂。这种共同的文化功能二者结合构筑了魏晋名士岩泽与音乐共远的精神世界。魏晋很多造园家同时也是音乐家，像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和阮咸在音乐上都颇有造诣。特别是嵇康，他不仅有《声无哀乐论》流传于世，还通晓各种乐器，尤善操琴。嵇康的广陵绝唱就曾被传为历代音乐佳话。谢尚则是“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即使如陶渊明这种不懂音律之人，在园林饮酒酣意之际，也会拿起无弦素琴抚弄一番。至于谢安游东山而吟啸不言、王徽之暂寄空宅也啸咏良久、陶渊明啸傲东轩下，更是以最为自然的肉声清歌应和着大自然的美妙节律。

围棋对于六朝士人，不但是一种娱乐休闲活动，还是士人雅量与文化修养的表现。淝水大战迫在眉睫，谢安尚能在园林别墅泰然自若地与谢玄对弈，足显其泰然从容。在魏晋园林和书法关系里，最典型的事件要属王羲之游兰亭所写的《兰亭集序》。传为王羲之在兰亭禊会中挥毫书写的《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被历代书家奉为书法经典。《兰亭集序》的书法应是与当日王羲之游赏兰亭的心境紧密相连的。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法笔势正好表达了王羲之在观赏兰亭美景时超然洒脱、放浪形骸的心绪。通过园林、音乐、棋艺、书法这些具有共同精神气质的文人艺术活动，魏晋名士构筑了自身典雅精致的生活世界。

园林是画境文心，也是思想园地。在以玄学为主流的文化氛围中，清幽雅致的园林还是魏晋名士清谈论辩的玄学道场。正始之后，魏晋名士的清谈逐渐由义理的探讨转向一种个人神情气韵的风度表演。因此，魏晋名士的清谈还具有审美性与游戏性。园林作为一个山水兼备、避风遮日而又住食无忧的场所，理所当然得到了清谈名士的青睐。竹林七贤不但在竹林阴翳的郊野园张扬了自身的生活情调，还可能围绕着庄学义理、养生、名教与自然、声无哀乐、宅无吉凶等诸多辩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王导把隐士郭文迎接住到自己的西园后，温峤等人就经常在此与郭文进行“钩深味远”的对谈。司马昱任会稽王时，曾把东晋清谈名士殷浩、孙盛、王濛、谢尚、刘惔等人召集在自己的园宅里进行清谈活动。清谈最后的结局是在座的所有人“拊掌而笑，称美良久”。魏晋名士的清谈更多属于一种日常生活中感悟宇宙与人生存在方式、存在意义的高雅学术活动，不可都以“空谈误国”来抹杀其文化意义。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在一种文化的乡愁中，我们不妨起步追寻前贤的文化印迹，迈入园林深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家风家训

黄乃裳：矢志利他 服务大众

□水海刚

近代海外闽籍华侨群体中，黄乃裳可谓一代传奇式的人物。

他一生多姿多彩，集革命家、社会改良者、新闻报界人士、教育家、传教士、传统士绅等诸多身份于一体，于近代中国和南洋遗泽深远。

黄乃裳1849年生于福建闽清六都湖峰村，幼时受私塾教育，18岁时受在闽传教士吸引受洗入教，后在当地教堂任职。在近代社会剧变的背景下，他致力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改良与革新，如大力倡导革除妇女缠足等。后来，他考中秀才、举人，并于北京参加会试期间，接受维新变法思想，曾自筹资金创办福建近代第一份报纸《福报》。戊戌政变后，他避祸返闽，次年更是至南洋觅地，以为垦殖移民之所。1900年，黄乃裳经过多方考察，确定婆罗洲诗巫（今属马来西亚沙捞越州）为移民垦殖目的地，先后在福建闽清、古田、闽侯、永泰等地招募大量垦农，移民诗巫，诗巫因此得称“新福州”。后世均把垦殖诗巫视为黄乃裳一生事业的巅峰。时至今日，当地华人仍称其为“港主”。黄乃裳积极参与晚清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先后于南洋、福建等地办报，宣传革命新思想。1906年同盟会南洋分会在新加坡成立，他加入同盟会，之后投身于福建地区的新式教育。1911年武昌首义后，黄乃裳参与领导福州革命党人的起义行动，并于福建军政府成立后任福建军政府交通部部长一职。袁世凯复辟后，他更是积极奔走，反对帝制。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他出任高等顾问，后因旧病复发，返闽医治。期间，出任福建省公署高等顾问，直至1924年病逝。

综观黄乃裳生平所从事各项事业，皆以“利他主义”为宗旨，“惟对天对人，矢志尽我余生，抱‘利他主义’，至于入墓之日，不敢偷活苟且而已。”在近代中国大变革的时代浪潮里，这一思想价值不容低估。在黄氏的一生中，“利他主义”一是为国，二是为众。与此同时，在黄乃裳这一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下，其家庭成员多也受到深刻影响。清末倡建新式海军，以巩固海防，发展近代事业，在黄乃裳的鼓励下，其二弟黄乃英、三弟黄乃模分别考进马尾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黄乃模更是因学业优秀，毕业后在北洋水师“致远”舰任职，以功升为枪炮二副，后随邓世昌于甲午海战时以身殉国。

黄乃裳的众多子女则更多地继承其“服务大众”的精神，皆学有所成，回报社会，其中尤以其长女黄端琼、次女黄淑琼为著。她们见识广博，学贯中西，一面践行其父倡导的妇女解放精神，一面以积极的姿态活跃于妇女教育和创作出版领域。

黄氏长女婿为海峡殖民地著名华人林文庆、次女婿为近代著名公共卫生防疫专家伍连德。林、伍二人的事业均与近代中国密切相联。林文庆追随陈嘉庚的“教育救国”理念，任厦门大学校长达16年之久，今日厦门大学校园内矗立的“文庆亭”，其铭文称赞他“倾其睿智才学，运筹操劳，主理校政十六载，学校事业蒸蒸日上，硕彦咸集，鸿才叠起，声名远播海内外，与公办名校并驾前驱。”伍连德则于1908年挈眷回到中国，被委托为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1910年东北爆发大规模鼠疫，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在4个月内控制了疫情。除此之外，伍连德还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林、伍二人生于南洋，活跃于南洋与近代中国，并于近代中国成就独特事业，黄氏姐妹功不可没。

黄乃裳纪念公园

近世名家，常有家风家训，然而后世子孙有切实践行者，也有弃之不顾者。由黄氏子孙后代的行为和成就来看，黄乃裳虽没有立下明确的家训条文，但却因其言传身教，为后代树立了明确的思想和行为典范。黄氏“一代闽侨传奇”的称号，此也应为理由之一吧。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